

# 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道路

◇陈俊杰

## 一、“中国道路”之基本概念

中国道路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断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道路成就的“中国奇迹”,主要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自主选择、自我实现的产物。中国以强劲、持续、渐进、有次序的改革主动探索、大胆实践与创新价值,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意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或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功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利益安全,强调独立性、自决权与发展权;重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力求发展一整套以业绩为导向的社会考核与竞争体系与以包容和谐为导向的社会民主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激励机制;在对外关系上不断积聚能量,逐步形成国际影响力。

## 二、最近40年中国经济之崛起路径

### (一) 思想观念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社会主义各国以苏联模式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模式而纷纷效仿,延续内战逻辑的新中国也只能以苏联为榜样。但随着计划经济的弊端不断加剧,各国开始抛弃苏联模式。这给中国也带来观念上的冲击,但此时国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层次较浅,缺乏经验,多数情况下

是将资本主义的一切都否定,包括市场的基本价值规律。极“左”思想将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向错误的道路,国内的学者及党中央都开始反思这种照搬别国发展道路的弊端,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吸收了挫折教训后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可以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破斯大林的关于商品经济的僵化概念,提出国家可以给予地方与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调动它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这一思想在后期并未贯彻,但为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同一时期,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也推动着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准确地、完整地学习与运用毛泽东思想。从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真正地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打破,消除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疑虑,从此在思想上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积极进取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在继承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思想上继续推进,在十四大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在发展道路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道路思想与时俱进,针对发展中的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的问题,胡锦涛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新的认识,“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提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走现代化强国道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 （二）市场激励体制的凸显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我国农村的改革,安徽凤阳一个生产队私自分田到户,粮食产量由此而猛增,得到中央的肯定后才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事业迅速发展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

体制外的改革冲击着体制内的改革,我国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国有企业的僵化体制与封建残余部分的改革,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阻力很大。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国企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随着改革在微观经营机制与资源配置方面推动,宏观经济制度与之不协调不配套的矛盾逐步暴露。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层面也做出了新的尝试,尤其是在财政体制方面“分灶吃饭”,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范围,中央拿小头地方拿大头以保住中央存量给予地方增量为基础,这就促进了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推动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设立的经济特区打开了沿海地区与国际的交流局面,大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开放。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平滑的改革,以体制外的改革为先,再触碰体制内的改革,先易后难,先试点再全面推广,从非国有制到国有经济逐步推动商品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 （三）政府放权及其自我定位

中国在最近40年里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这期间政府发挥的功效不可小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地方政府对企业微观层面的放权,给予企业硬的法律约束以加快其适应市场的步伐,使得沿海地区经济特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政府的分权基本上形成了倾斜分权、纵向分权、经济分权的格局,在带来的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少问题出现。比如倾斜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竞争,扩大了东西部差距,压抑了中西部地区的积极性,出现了资源配置与流向不合理的现象;纵向分权引发了地方保护主义、个人专断等问题;经济权力的下放掩盖了政治权力的下放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

政府具有两面性,既可以成为保护人民的天使,又容易成为腐败的根源。如何抑制腐败的一

面,发挥天使的一面,是政府自身要寻找角色定位的问题。适合政府的是要利于人民的,同样利于人民的才是适合政府的,政府的角色应是打破“官本位”的思想,站在“民本位”的角度去思考,便知道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利民的有效政府。人民理应谨慎乐观的看到,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便民利民的高效政府。

##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基本走势

### （一）由量到质的高端经济

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发展为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强”的核心理应是科技竞争力。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已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此习近平提出新时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主要从增长速度、经济质量、经济效益三方面来考量,其中经济质量要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在高质量上保持稳定的速度才能保证经济效益达到一个高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还处于通过单纯增加物质投入来促进增长的较低阶段,这是一种粗放式增长,高质量的发展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分散走向集约,利用技术创新培育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要看企业的产品质量。新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对商品的要求更高质量、高品位,需求改变供给,推动供给侧的改革,这要求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提供更高品质的商品,打造高端的中国智造,而国企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更要首当其冲,企业内部制度、管理都要向现代企业制度看齐;中观层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产业链的发展,产业上下游的配合,各产业间的信息交流也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质量,要进行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各产业之间更加的协调。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更加活跃,第二产业走向技术化,在高端技术上不再为外国所制约,第一产业跟上时代的步伐,让农民成为21世纪的农民,技术的农民,智慧的农民,能实现粮食生产从土地到市场的一系列环节更加优化;在宏观层面上,中央与地方政府都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调控分配性努力的制度、抑制失控性努力的制度将推动经

济发展走向更高质量。在创新、科技、教育方面需要宏观上的支持与引导,在效率与公平方面需要宏观上的再平衡,推动经济增长以高质量为基础,以稳定发展的速度提升整体的增长效益。高质量的发展包含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层面再到微观层面三层面的发展,只有三个层面齐头并进拉动经济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持续拓展国际市场。

### (二) 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方案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国际市场是发展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必然之路。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可,则必须有一国的特色而不是沦为某种西方经济模式的附庸,话语在国际上拥有说服力。中国未来的经济道路也必然是要在国际上去与各大国之间进行“软国力”的竞争,现今时代科技、人才、管理、文化越来越成为竞争的重要筹码,对内本要鼓励科技创新,夯实发展基础,对外要在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方案。

中国方案包含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模式的借鉴,还有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建构,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大国发展观、外交观等顶级制度设计,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落到实处的微观方案。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不断地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在大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为发展中国家发言,要为新兴经济体发言,使全球治理能朝着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各国之间是一种睦邻友好的关系而非敌对,是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在具体行动上,近年来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将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传达给国际社会并获得广泛支持。

在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的时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反恐、网络安全问题成了整个世界的问题,中国要更加积极开放的融入新的全球化浪潮中,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在全球治理方案中贡献中国智慧,在外交媒体上塑造中国的话语特色,在国际联络上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关系,智慧的平衡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让中国方案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行动上的支持与理念上的认可。

### (三) 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建构

中国走向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展问题,还有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构建一个完善的中国经济理论摆在眼前。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指导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建设的实用主义理论,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在实际操作中时常走向极端,而在倡导引进市场体制时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在教育上又较为偏驳。

无论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单纯的照搬在实践中都容易走向极端,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必然要伴随一个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崛起。古典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复兴,则有必要结合以儒学为标杆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新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路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补市场经济的课,其前途的要点在于合理的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唯有政府与市场两者相互搭配,找到两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各自优势的“黄金分割点”,才有可能构建好适合中国崛起道路的政治学理论。

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既需要有在宏观理论上为社会指引方向,使整个大方向向着正确的一面行走,在战略上以维护国家利益、国民利益为基础,同时更需要在具体的微观领域内的踏踏实实研究创新,能为社会发展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治应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的发展应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的终极指向都理应以为为人民服务为中心,为人民营造一个美好、健康的生活环境,推动生产力向共产主义的人类生产力巅峰发展,中国道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追求理应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构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之内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作者简介:陈俊杰,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摘自《经济论坛》2019年第8期)